

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刘圣宜 著

近代广州社会与文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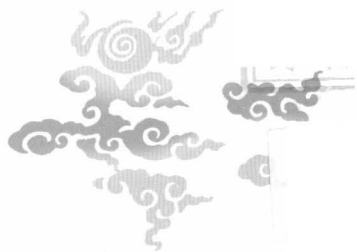
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刘圣宜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近代广州社会与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广州社会与文化/刘圣宜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2

(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ISBN 7-5361-3126-7

I. 近… II. 刘… III. ①社会发展史—广州市—1840—1919
②文化史—广州市—1840—1919 IV. 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1742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 510500 电话: 87557232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90 毫米 × 1 240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301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 000 册

定价: 19.00 元



前言

“社会”与“文化”是两个包涵范围极广大的概念，以“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分类而言，社会有大社会与小社会之分，文化也有大文化和小文化之别。大社会与大文化，对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无所不包，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而小社会和小文化，则是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概念相类似，特指人类生活的某一范畴。概念是人创造的，概念便于人对自身的状况作出真切细致的说明。以此为理论依据，我们可以这么说，人类自从组织社会、创造文化之后，社会与文化便日益发展，成为人类进化的标志。

中国社会发展到 1840 年，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我们或者称之为从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者称之为从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又或者称之为从古代中世纪社会进入了近代社会。不管怎么说，1840 年前后的中国有很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非常鲜明地反映在文化上。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基本同步，并且互相推动和互相影响。当今学界认为，从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来描述和概括 1840 年后的中国是再合适不过了。

众所周知，因地域环境、人文环境、历史传统、经济基础等原因，近代广州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和转型，不少方面领先于全国，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先行一步，更加突飞猛进，成就有目共睹。进入 21 世纪，广州将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前景辉煌。追踪广州发展的步履，寻找广州发展的动因，总结广州发展的经验，展望未来广州发展的走向，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写近代广州的书很多，但从社



会和文化角度考察的很少。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简练的文笔，再现1840年前后到1920年前后的近代广州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历史过程，描绘近代广州文化在对中国古代文化承传改造、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而自身发生变迁的态势与面貌，剖析广州在转型的初始阶段如何跨出艰难而关键的第一步。本书在综述社会大事实、社会思潮、学术传统、精英文化的同时，极力挖掘一些过去关注不够的事物，如世俗的、民间的、日常生活的、非主流的、看似琐屑其实重要的史实，以补充学界研究之不足。在选材上，偏重于变化比较剧烈的人和事，以反映近代广州发展的趋向。

研究近代广州的社会与文化，毕竟是一个大题目，要做好这个题目实非易事，加上史料的收集和鉴别工作难度甚大，本书的错漏和粗率之处一定不少，期待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



目 录

目 录

导 论 近代风云的变幻与广州文化的发展	(1)
一、承上启下, 发扬实学经世传统	(2)
二、兼收并蓄, 学习西方先进文化	(5)
三、倡言改革, 推动文化领域各门类的创新	(8)
四、跨越时空, 追赶世界潮流	(10)
第一章 “闭关思想”与一口通商	(13)
一、西方势力的东来与清政府的“闭关思想”	(13)
二、“闭关思想”对中外贸易发展的障碍	(18)
三、矛盾的激化与清政府贸易制度的瓦解	(22)
四、广州的商业文化与市井风情	(28)
第二章 鸦片战争与守土观念	(34)
一、鸦片输入与反输入的斗争	(34)
二、华夷观念与律劳卑事件	(39)
三、1839—1841 年的广州战事	(47)
四、守土观念与地方运动	(54)
五、天地会起义与广州城的失守	(66)
第三章 “师夷长技”与认识世界	(71)
一、西方军事技术的传入	(71)
二、广州近代科技先驱	(75)
三、世界史地的介绍与研究	(83)
第四章 香港开埠与西方文化传入广州	(92)
一、香港开埠后华商迅速崛起	(92)
二、西方文化进入香港并向内地扩散	(95)

三、《循环日报》对沟通中西所作的贡献	(101)
四、英国文化模式与广州改革思潮	(109)
第五章 开放教禁与传教事业	(117)
一、开放教禁前基督教在华活动	(117)
二、基督教在广州传播的契机与困难	(122)
三、梁发、洪秀全、洪仁玕与基督教	(130)
四、短暂的黄金时代	(143)
第六章 教会教育与留学运动	(146)
一、教会学堂的出现	(146)
二、容闳和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	(154)
三、留学运动的兴起	(165)
第七章 西医传入与医院建设	(173)
一、“种牛痘术”和其他西医技术的传入	(173)
二、嘉约翰医生的贡献	(182)
三、西医学堂和医院建设	(186)
四、中西医学的会通和实践	(189)
第八章 近代书报刊与舆论意识	(194)
一、西方书刊与印刷术的传入	(194)
二、广州人创办的近代报刊及其发展	(200)
三、图书的刊刻与收藏	(205)
第九章 近代科技与工业发展	(211)
一、船坞的兴建与造船业的创办	(211)
二、机器制造业的开端	(213)
三、机器纺织技术的推广	(216)
四、其他工业技术的引进	(218)
五、电信技术的应用	(220)
六、铁路的修筑	(222)
七、广州近代工业的特点	(223)
第十章 学术经世与理论创新	(226)



目 录

一、传统经世之学的继承和发展	(226)
二、中西文化的会通与创获	(233)
三、社会主义学说的传入	(238)
第十一章 文艺革命与地域文化	(247)
一、文学革命理念的提出	(247)
二、文学革命的酝酿与实践	(250)
三、富有地域特色的戏曲与绘画	(259)
第十二章 教育改革与新学兴起	(267)
一、清末科举制度与广州的书院	(267)
二、洋务学堂的创办	(272)
三、民间新学的兴起	(279)
四、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	(283)
第十三章 社会生活与风俗习惯	(288)
一、《资政新篇》提出的社会风俗改革方案	(288)
二、崇洋的生活方式和心理	(290)
三、等级尊卑的淡化	(294)
四、商业发展对传统道德造成冲击	(297)
五、妇女地位的转变	(300)
六、恶习和陋习的泛滥	(307)
第十四章 商业发展与城市变迁	(318)
一、商业的低落与回升	(318)
二、沙面租界与外国商行	(325)
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329)
后 记	(336)



导论 近代风云的变幻与 广州文化的发展

广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具有鲜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广州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一分子，又富有地方色彩，“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一道，属于岭南文化的主脉。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时代的嬗变，古老的广州文化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使人刮目相看。

广州文化在近代的转变，与时代的风云息息相关。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战争和工业文明的强大攻势下，中国开始了从封闭向开放、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艰难历程。近代广州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火车头，它的反侵略精神与勇气辉照一时，它向西方学习和改革中国的动作先人一步，它的故事与人物到处传颂。广州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向西方寻找知识和真理的先进人物，林则徐、梁廷枏、邹伯奇、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刘思复、杨匏安，这一连串中国人所熟知的名字和他们的业绩，标示着近代广州社会和广州文化取得了开风气之先的地位，从而也较早地进入了接触、了解和吸收西方文化的阶段。在他们手中，西学，也即新学，成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他们所提倡的科学思想、民族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为依据的。中国传统伦理和学术开始了更新和改造，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史学革命、国画革命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近代深刻而激烈的社会变迁使广州文化在各方面都起了显著的变化，成就令人



瞩目。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种变化，只是一个开头。

一、承上启下，发扬实学经世传统

广州文化在近代发生变化的首要原因，是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内忧外患的危机面前，知识界经世致用的学风重新抬头，一扫空疏之颓气。

鸦片战争后，面对来自西方的威胁，广州知识界以学术经世的态度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林则徐在广州时，出于对外防御的需要，开始注意收集西方国家的情报，翻译西方的书刊，打破对西方世界隔绝和无知的状态。他“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他将译出的资料，亲自审阅修订，于1840年前后编译出《四洲志》、《华事夷言》、《达滑尔各国律例》等书。《四洲志》概述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重点为英、美、法、俄诸国情形，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有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译作，吹开了中国人研究西洋地理历史的风气。《华事夷言》则是鸦片战争前夕西洋人对中国的时事评论的编译，大抵摘西人杂志、报纸中有关中国的议论而成。此书在当时颇为流传，成为中国人了解外国人思想观念的第一本参考书。《达滑尔各国律例》是对瑞士人达滑尔（Vattel Emeric De）所著《各国律例》（*Law of Nations*）的选译。《澳门新闻纸》是对英国人办的《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的选译。林则徐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打破禁区，带头留心夷事，关注夷情，甚至还第一个提出“师敌长技”的主张，在继承传统经世思想的同时，把经世的内容加以扩充，使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添了时代感和开创性。林则徐走出的这一步，带动了广州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自此之后，过去被士大夫鄙视的“夷务”开始作为一门新的学问，列在经世之学的名下。

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它把学术



研究和社会需要紧密结合，治学目的十分明确，研究内容求实求真，研究成果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经世致用的学风在盛世时隐藏不露，衰世时风起云涌，虽断断续续却历久不衰，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积极的、入世的取向。

梁廷枏是广东顺德人，曾任广州越华、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学长，广东澄海县训导等职，一向留心实学。1835年，两广总督邓廷桢聘请他任广东海防书局总纂，主编《广东海防汇览》，次年又聘其为《粤海关志》总纂。在编书中，他不但收集了大量鸦片战争以前中外贸易的资料，而且还“采集海外旧闻”及各种报章、西人著述中的外国史地资料，逐渐积累了不少有关海外的知识，成为当时广州有名的“外国通”。鸦片战争后，在林则徐等人的鼓励带动下，梁廷枏开始了史学经世的学术创新，他于1844年撰写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美国史。它充分利用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材料真实可信，知识全面系统，非旅途见闻，更非天方夜谭，当时在国内是质量最好的世界史地专著。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称美国为米利坚，只是洲名的音译，不是国家的名称，米利坚合省国才是这个国家的正式名称，因为“曰合省国者（亦称合众，或称兼摄邦国、联邦国、西语为‘育奈士迭’），称其国内所分之地为省，前分后合，从质即以合省名”^①。向国人解释清楚了美国的联邦制的性质。他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对水如何受热成汽，推动活塞工作，如何发动、牵引车船行走，均作了详细说明。梁廷枏的研究成果充分表现了广东文化的先进性，到今天历史学者们都是承认的，他们把这种情况形容为“春江水暖鸭先知”。广东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关注最早的地方。

当时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还大多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主要在船舰、火器方面，“师夷长技”，一般是指军事技术。梁廷枏在

^① 梁廷枏：《合省国说》卷1，12~13页，1844年刻本。

近代历史与社会文化转型丛书

《海国四说》中指出，英、美等国强盛的重要原因，“实以贸易为本务，所入视农工远甚，统领之所劝奖者固在此。盖税之所出，国用攸资也。”^①他认为美国的开矿无禁政策，英国的免税进口农器政策、奖励发明创造的法令等对促进和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他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统领限年而易”等民主选举和法制使得美国统领在任期内能够“力守其法”、“殚精竭神”，而美国的政治也少有“贪侈凶暴”的现象。不过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度“是必米利坚之地之时而后可”，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仿效。这些文字表明了他对西方世界认识在深度上已经走在时代的前列，而且对哪些做法好、哪些做法可为中国仿效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意见。

在广州，探索世界知识的活动当然不止林、梁两人，一些比较开明的中小官吏、学者、通事、买办、教会学生、归国华侨等也都兴趣甚浓，官吏如邓廷桢、怡良、关天培等，士绅如张维屏、俞正燮、丁拱辰、邹伯奇等，有的认真收集、翻译外国书报、地图、奇器，有的自己著书立说，有的再版有关海外情况的旧籍，以探索、了解、介绍世界知识。这些文化活动，继承了历史上的经世精神，又发展了传统学问，更新了知识，承上启下，为广州文化变迁开了一个好头。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认识世界成为广州人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课题，由此，学术成果也以研究西方军事技术，世界史地和对外关系等最为突出。

鸦片战争后，学者们不断在传统学术研究实践中贯彻强烈的经世意识，使学术走出象牙塔，成为解决重大时务的有用武器。在鸦片战争前后再度兴起的今文经学，不株守古代典籍的章句文字，而侧重探索其微言大义，有其独特的治学门径。随着中国社会危机加重，研究今文经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今文经学家攻击古

^① 梁廷枏：《合省国说》卷3，15页，1844年刻本。

导 论

文经学之风，也日益流行。康有为治今文学，便有学术经世的意图。他的著述较多，重要的有《王制义证》、《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新学伪经考》、《孟子为公羊学考》、《论语为公羊学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这一系列著述的中心思想，是“发古文经之伪，明今文学之正”。康有为把古文经斥为伪经，认为今文经才是孔子真传。又说孔子是受命于天、有德无位的素王，孔子创作“六经”，是为了托古改制。他推崇《春秋公羊传》，把其中所讲的三世之别与《礼运篇》所讲的“大同”、“小康”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这些都是康有为想利用今文经的微言大义进行议政的经世思想使然。虽然，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这些论断不免有牵强武断之处，但在当时却大大冲击了“无一人敢违、无一人敢疑”的古文经典的正统地位，在思想界掀起一阵飓风。保守的学人惊呼：《新学伪经考》使“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①。他们纷纷要求朝廷将此书焚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的经学研究为其“托古改制”、“君权变法”的政治理想服务，推动了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有为可说是把学术经世发挥到了极致。

经世致用之学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实”字。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各种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实务，标示着近代广州文化适应着时代的要求，由空疏向切实转变的趋向。

二、兼收并蓄，学习西方先进文化

广州作为一个有着 2 000 多年历史的商城，自然不乏文化开放和兼容的风度，虽然清代全国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是闭

^① 《朱荅生答康有为第四书》，见苏舆《翼教丛编》卷 1，12 页。

关锁国，但广州由于一口通商，与外国的交流一直不断。不过，近代以来的文化交流，却是过去无法比拟的，这也和时势的变化有关。首先，和平时期的文化交流和战争时期非常不同，这不是风度问题，而是生死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既是侵略的文化，又是先进的文化，中国人既要抵抗侵略，又要向侵略者学习，这不是一个容易协调的矛盾，期间的敌视、冲突、排拒、斗争异常激烈。广州人经历了痛苦之后，开始冷静地思考、理智地选择、艰难地摸索中国前进的道路，迈开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步伐。其次，在学习西方的内容上，关注的不再是奇珍异宝等消费性商品，而是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民主思想。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融合中西文化的新问题上，广州人探索的步伐和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广州最早出现了异军突起的一支文化流派，这便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思想理论。在大多数人还视西方宗教为异端邪说的时候，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结合中国儒家经典义理，创造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文化。其代表作是《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天朝田亩制度》等。洪秀全把中国经典里“公羊三世说”中的“太平世”和基督教《新约·马太福音书》里的“天国”合起来，创造出“太平天国”的新概念和新理想。又用“拜上帝教”教义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军的思想信仰、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体系。虽然洪秀全的“中西合璧”、“耶儒合璧”的创造在文化融合上并不成熟，在学术上价值也不高，说不上是成功的例子，但对于引进西方思想观念，冲击中国保守、陈旧、封闭、自大的文化风气，有积极意义，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大胆尝试。

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康有为在戊戌年间倡言变法，他试图会通中西，融贯新旧，把中国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同西方的进化论糅合起来，作为变法的理



论根据。但限于历史条件，只能让孔子穿上进化论和民权论的外衣，用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去附会天赋人权之说，把伸民权和尊君权的旗帜同时高举。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的认识迅速提高，君主立宪思想和“新民”学说的产生便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新成果，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说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属于从旧式士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变的类型，那么自从留学欧美、日本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出现后，广州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便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折。近代中国学生赴欧美留学的风气自广东始，广东香山人容闳、黄宽、黄胜于1847年到美国留学（黄宽后来又转赴英国）；1872—1875年由容闳带领的4批120个公费留美幼童中，有84名是广东人；广东南海人何启于1872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广东新会人伍廷芳于1874年自费赴英国留学；1879年孙中山赴檀香山求学。他们均是中国留学生之先驱。他们在西方社会环境影响下接受西式教育，逐渐成为知识结构和思想素质与中国传统士子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把西方的先进文化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带回中国，与中国文化中的优良成分加以融合，因而有了新的发明创造。其中最为杰出的文化成果便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时，已提出“驱除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革命纲领。在1896—1897年间于伦敦暂居时，又利用英国博物院图书馆极为优越的读书条件广泛阅读西方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军事等方面的书籍，美国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和德国杰出学者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和兴趣，为他的民生主义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加上在国外实地考察世界大势，和中外志士们反复探讨中国的前途，孙中山终于形成了中国文明须“取法于人”，而且要“取法乎上”的观点，从而在1905年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三民主义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在鼓舞和指导资产阶级革命



派和广大人民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中国学术进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飞跃，也是广州近代学术的一个开创性成果，昭示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是中国学术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广州的学术思想在近代之所以能有超越于内地的发展，实源于此。

三、倡言改革，推动文化领域各门类的创新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救国的行列中去，动员人民和催促文化的大众化和政治化，文化领域各门类都要适应新的形势。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和运动勃然兴起，维新派在鼓吹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倡导文学革命，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黄遵宪、梁启超、丘逢甲等广东籍维新派成为这场文学革命的首脑。

文学的更新，是从文学理念的变革开始的。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高呼“诗界革命”的口号，在其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再把“诗界革命”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饮冰室诗话》近10万字，是梁启超在诗歌创作理论方面的一部重要专著，它回顾了戊戌变法以前维新派提倡诗歌革命的情况，对走过的道路进行了反思，得出了“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结论，反对“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做法，认为“以旧风格含新境界”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才是正道。他突出地强调了新名词与新意境的结合。他对当时的三位诗坛健将——谭嗣同、黄遵宪、丘逢甲的诗歌创作进行了热情的介绍和大力颂扬。

梁启超也是近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1898年，梁启超在日本办《清议报》，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进一步对小说界革命加以鼓吹，提倡以政治



小说转变国人言论，推进政治变革。他说：“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澳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① 1902年，他又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对小说的社会作用作了完整的论述。他认为，一般中国人的“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大都从旧小说得来，所以小说要进行革命，要弃旧图新。新小说应给人以理想，给人以知识，从而振刷国民精神，提升国民道德。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 提出以小说来开通民智，改造社会。

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还正式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所谓“文界革命”，其实就是要把散文从桐城派古文的禁锢下解放出来，自由地写作。改革的内容一是提倡语体合一，二是革新内容，反对空洞无物。这个革命成为了“五四”后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近代的散文，在以陈述时务、议论政事为主题的时务文和政论文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就。为适应社会政治剧变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它打破了古文艰深的文体风格，以一种自由奔放、通俗易懂的姿态登上了文学的殿堂。

在文学革命理念的指导下，文学改革实践无论是诗、文还是小说的创作都出现了新气象。这一时期广州的诗、文创作，以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丘逢甲为代表，小说创作以吴趼人、黄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34~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6~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